

海外中国学

摆脱媒体局限 实地考察中国

□本报记者 小乐

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是如何教中国课程的?他们在教学中有哪些体会?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先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和中华帝国晚清教育史)应本报之邀,谈了他的感受。

艾尔曼教授开设了针对本科生的“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中国和亚洲在西方的形象”、“中国历史”以及针对研究生的涉及中国经典文献工具书、中国教育史、中国科学史和中国物质文化与技术等课程。艾尔曼教授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世界史教科书《分分合合》(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2008),并编辑了一部在线中国经典文献工具书录(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r Chinese History),网址请参见: http://www.princeton.edu/~classbib/



王磊摄

教会美国学生 更客观地看中国

记者: 请谈谈您在给美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时的教学感受和理念。

艾尔曼: 我们的学生包括华裔学生总体上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多源于一般报纸,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也不多。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的历史与21世纪无法割裂,无论是从汉唐到宋明这一辉煌期,还是后来发生的历史。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原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甚至还有人口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中国在近代走下坡路?如今,中国又重新发展起来了,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与18世纪乾隆时期的中国、与宋代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全球历史大背景下的中国在每个朝代有何特点,它们与世界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历朝历代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与国外有什么关系,朝鲜、美国等国家派了哪些人到中国?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希望学生了解的。

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与中国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社会上和学校中对关注中国不多,在那个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美国是敌人,彼此也缺乏沟通与了解。但是现在情况大有改观,我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而且两国间关系也日益密切。当然,了解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对付中国,而是要厘清大国的历史进程和对中国有更客观的了解。这些学生都很聪明,今后他们不一定搞历史,会在政界、企业界和社会其他各个行业工作,并产生各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一点、更客观一点,这对国家间的友好互信与世界更好的发展都有裨益。

另外,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语言障碍,二是有着较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首先是语言。这些大学生大多中文功底不深,研究生就好多了。我们很希望学生能够用中文来研究一些问题,但是这对大学生而言较难做到。当然,也有一些学

生的中文不错,他们中还有用中文写毕业论文的。但总体上,学生因语言问题,在资料阅读与研究方面受限较多,特别是在一些领域,英文资料的局限性比较大,而且译成英文的版本可能与原作的十分相悖,比如杜甫的诗译成英文后,就失去了很多原汁原味的韵味。

还有一个问题,许多学生在上大学前就带有偏见,这些偏见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等渠道。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知道,不应该按照原有的印象,要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构建正确的认知。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去中国大陆、港台地区,还有新加坡等,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学生对中国的更加客观的认识。

教会中国学生 局外人身份看中国

记者: 在您看来,教授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有何不同?

学苑掠影

把地方文化、人文特色 融入亚洲地区研究

1978年成立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亚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IAR)如今已步入而立之年。30多年来,IAR一直在加拿大的亚洲研究特别是在当代亚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始终注重对亚洲地区跨学科知识发展的密切关注,侧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策略性研究,同时将温哥华特有的地方文化与人文特色融入其中。

追溯历史,1961年美国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麦卡锡主义泛滥这一特殊背景下被关闭,其所长 Bill Holland 接受了UBC的聘请,成立了新的亚洲研究所。1970年,UBC又创建了亚洲与斯拉夫(Slavonic)研究所,以适应日益增加的亚洲和远东研究的教师数量。1977年,部分亚洲研究人员独立出来,亚洲研究所正式成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IAR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极大地促进了UBC与这些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也为亚洲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研究所开设了加拿大最早的亚太政策研究生项目,倡导在整个大学范围内进行关于当代亚洲的跨学科研究。它同时也是一个政策咨询中心,为促进加拿大与亚洲各国的文化沟通以及亚太地区间的理解与对话提供了一个窗口。亚洲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研究项目有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贸易与人权、自然资源与可持续

性、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加亚关系、亚太地区的移民与流动性、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都市化、政治与法制改革和贫困管理环境政策等。

多元化和国际化是UBC的一个重要特色,超过20%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而亚洲更是重要的生源地区。在UBC的1800名教职人员所做的研究中,10%左右的研究与亚洲有关。该校与亚洲很多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如“三三协议”(UBC、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机制)。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是亚洲研究所主办的著名刊物,也是英语期刊中最早进行亚太地区研究的。自1982年创刊以来,它一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为亚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洋事务》每一期内容都涵盖了当前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问题,每个领域有5篇左右文章和40—50篇书评。

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创建于1992年,它的宗旨是:强化UBC的中国研究;鼓励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大中华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加拿大与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之间的互动;加强中国研究学者与其他亚洲研究学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在地方社区开展各项活动,加深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张颜语/编译)



从现代性批判 到文化帝国主义

□于秋阳

黑格尔在描述哲学史发展时曾提出了两个经典的比喻,一是将哲学史的发展比喻成“厮杀的战场”,认为表达新时代的哲学要获得统治地位,必然要通过对表达旧时代的哲学的批判。二是“花蕾、花朵和果实”,正如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

不应从主客二分的角度 看待现代性

知识分子的思辨方式是相同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天职也是相同的。在社会学领域中,对现代性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就是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不断否定、同时又是不断“扬弃”的过程。

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时代性的叙事。当现代性成为一种主流思想时,这意味着思想界中世纪的结束。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等著名思想家发现了现代性的世界观,比如:人是自然的解释者,人是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主体能自我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等等。现代性有两个核心概念:理性和主体性。科学理性在成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遇到了难题,因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是用目的的实现来证明手段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将这种只认客观、不分善恶的叙事套用到社会上必然会出现种种霸道的叙事。面对自然界屡试不爽的“奥坎剃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显然无法做到像维也纳学派所期待的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的绝对分离。这使得科学理性成为了一种霸权的话语。同样,主体性在打倒上帝的时候,把自己树立为上帝,但是主体性无法克服人类主体的两个内在难题:一方面,人类社会的任何行为

艾尔曼:最近几年,我每年都会来上海复旦大学给学生上课。在与中国学生接触的过程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如何让他们学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通常,作为一个局内人,从内部看中国,似乎什么都知道,但这不是一个全面的回答。我可以把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介绍给学生。在方法论方面,我一向强调要疑古,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学生往往比较容易相信并接受一些通常的观点,习惯于被告知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一点,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也有某些相似性。要教我们的学生学会怀疑。当然,有人说我们已经怀疑太多了,需要学会相信,但是这可能会导致轻信,而它将十分危险,容易无法正确认识客观真相。比如,今天下午我上课的内容是让学生看一段材料,关于何炳棣与社维明的辩论,我不会告诉他们谁对谁错,要学生通过看材料并自己作出判断,这十分重要。

将哲学史的发展 比喻成……“花蕾、花朵和果实”,正如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

都是有意义的,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研究者都拥有自身的规范、价值观和理解力。

知识始终与权力融合在一起

本着利奥塔所说的“对元叙事的信任”和对“他者”的关注,社会学家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而福柯显然是这个批判阵营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提出,福柯所说的权力大体相当于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经济利益等构成的知识生产的背景、主体、氛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一种网络,严重制约甚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相信,可以把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知识与政治绝对区分开来,从而产生一种绝对的科学。福柯在研究了监狱、精神病院、学校和大众媒介等现代社会制度后指出,如果承认知识的作用是使人理解现实生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自己的方向,就不能不承认,知识始终与社会、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有知识的目的在于确定统治结构的合法性。福柯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对于自我的表达,必须立足于特定的语言系统;个

环球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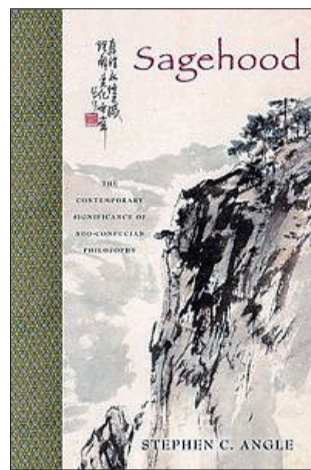
李侃如: 中国会怎样解读奥巴马的国情咨文

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月27日晚(北京时间1月28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2010年国情咨文,介绍他对当前美国国情和未来的构想。1月29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围绕中国将可能如何解读奥巴马总统的首个国情咨文发表了见解。他认为,中国理解奥巴马的改革着眼于长远目

标的良苦用心,但更关注的是其改革方案能否得到国会的认可,从而将改革落到实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重估人民币币值、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等,然而,美国自身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力不从心,对此中国存有一些疑虑和担忧。他指出,中国的态度将是察其言、观其行,关注国情咨文的后效。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作 《圣:新儒学的当代意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最近出版了《圣:新儒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它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新儒学哲学,同时也是首部讨论儒学传统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代表人物之间恒久对话的专著。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圣”、“理”、“德”与“和”这四个关键词,第二部分从伦理与心理角度探讨了新儒学,第三部分分别从教育和政治领域研究了新儒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当代儒家哲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是论证了西方哲学家研究新儒学传统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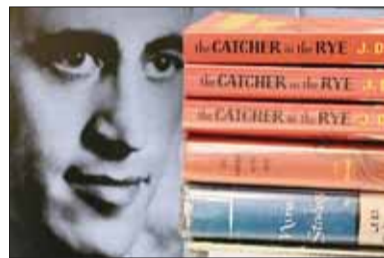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去世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于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30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公认为“现代经典”——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无形人》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是塞林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全书以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的口吻叙述,塑造了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反英雄形象之一。该书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至今仍十分畅销。

塞林格1919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干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15岁那



年,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原型的。1936年,塞林格从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除著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外,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九故事》(1953)和中篇小说集《弗兰妮与祖伊》(1961)、《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1963)。

(李萍、怀畅、国飞/编译)

西方文化 影响而非支配着第三世界

理论往往是激进时代的产物,当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其精华才会被理论的梳理者发现。1991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从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批判这四个角度,对种种代表批判阵营的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叙述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文化霸权” 赋予后殖民主义持久耐力

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不得不提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前提是:殖民帝国属于一个文本化的概念。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解释为文化霸权。学者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了后殖民主义持久的耐力和力量。

在“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下,赛义德对之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以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为标志,后殖民批判理论达到了自觉与成熟。赛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是文化象征活动的总称,包括语言、书写、文本代码等等,这一整套对待扩张和对外统治的意识符号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通过社会的受到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理论往往是激进时代的产物,当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其精华才会被理论的梳理者发现。1991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从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批判这四个角度,对种种代表批判阵营的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叙述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首先,汤林森认为西方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影响”而不是“支配”;其次,从媒介帝国主义角度出发的媒介研究夸大了媒介在现实中的作用;再次,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的学者,忽视了文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存在交流、融合和相互影响;最后,汤林森提出了自己的建构:“现代性”不是文化的宿命,在西方文化本身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将被致力于全球各地域联系的“全球化”所取代。

这番对批判的批判正好验证了黑格尔的比喻,理论的批判史是个不断批判、不断继承的“扬弃”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的渊源是关注“他者”的后现代哲学的兴起,只有将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现代性批判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全貌,才能使文化帝国主义在推翻一个元叙事的同时,不再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元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